

## 战后日本安全政策演变剖析

朱清秀 吴怀中

**内容提要：**战后长期以来日本政府坚持“专守防卫”政策，只发展最低限度的防卫力量。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日本国内政治环境的改变，日本的安全政策开始由重防卫的“专守防卫”，向强调先发制人的构建“反击能力”的方向转变。日本构建“反击能力”不仅违反“专守防卫”政策，同时也将加速战后日本“和平宪法体制”的解体，对亚太地区安全形势及周边国家关系产生冲击。随着日本远程打击武器的陆续配备以及无人军事科技的发展，未来日本的安全政策势必朝着更为激进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专守防卫 和平宪法 安全政策 反击能力 日美同盟

**作者简介：**朱清秀，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吴怀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北京 邮编：100007）

**中图分类号：**D731.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498/j.cnki.dbyxk.2023.06.002

**文章编号：**2095-3453（2023）06-0019-11

日本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其安全政策的发展受到国内外各种因素的限制，日本政府也向国际社会承诺不做军事大国、不保有陆海空军及其他军事力量，只发展最低限度的防卫力量。然而，随着自身实力的发展及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的安全政策开始从“重防卫”的“专守防卫”，向追求安全“自主化”和“军事大国化”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岸田内阁推出的新版“安保三文件”更是将日本自卫队打造成能攻能守的“国防军”，推动日本在“军事大国化”道路上加速前进。为此，在日本安全政策面临转折之际，分析战后日本安全政策的起源以及发展演变，对于评判未来日本安全政策走向以及国家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意义。

## 一、战后日本安全政策的缘起

战后日本安全政策的主体框架和内容基本上成型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到50年代初的美国占领时期。日本战败后，美国军队以“盟军”的名义单独占领日本，为了防止日本再次构成挑战，占领初期美国从政治、经济、军事及社会文化等领域对日本进行全方位改革。为了进一步削弱日本，剥夺日本发动战争的权力，在驻日盟军司令部（GHQ）的主导下，日本政府制定了《日本国宪法》，并于1947年5月3日正式施行。《日本国宪法》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放弃战争，否认军备及交战权”。<sup>①</sup>《日本国宪法》的正式实施为战后日本安全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影响，使得日本不能毫无约束地重整军备，强化军事实力。更为重要的是，“和平宪法催生了日本一系列的重要防卫基本政策及原则，例如‘专守防卫原则’‘不做军事大国方针’‘无核三原则’‘武器出口三原则’等，同时，还给日本安全政策带来一个重要特质——法无规定即不可为的法制教条主义，任何安全防卫重大政策及行为，都需要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及其准允”。<sup>②</sup>也正是由于《日本国宪法》对战后日本发展军力的限制，使得修宪成为自民党的“宏愿”而写入党章。

### （一）“吉田路线”的诞生

随着美苏冷战的爆发以及朝鲜战争的发生，日本在美国安全战略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美国一方面通过签订《旧金山和约》来实现与日本的“片面媾和”，另一方面则和日本签订《日美安全条约》，形成美国保卫日本及日本向美国提供基地的不对等的日美安全关系。正是在《日本国宪法》和《日美安全条约》的双重约束下，战后日本的安全政策的框架初步形成，那就是重经济、轻军备的国家安全及发展路线。由于该路线是时任日本首相吉田茂全力推动，因此也被成为“吉田路线”。

“吉田路线”是战后日本政府探索如何在和平宪法及日美同盟双重约束下走符合日本国情的一次重要尝试，其坚持轻军备、安全靠美的政策导向以及重视经济发展的路线深刻影响了战后日本经济社会的发展，为日本

<sup>①</sup> 《日本国宪法》，日本国驻华大使馆，[https://www.cn.emb-japan.go.jp/itpr\\_zh/ken-po\\_zh.html](https://www.cn.emb-japan.go.jp/itpr_zh/ken-po_zh.html) [2023-06-08]。

<sup>②</sup> 吴怀中：《战后日本安全政策的演变》，《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1期，第32页。

在20世纪70年代重回世界经济大国行列做出重要贡献。然而，“吉田路线”并非是要日本完全放弃发展军力，其只是强调经济优先。

## （二）“专守防卫”政策的确立

朝鲜战争形势的快速发展，使得日本“再武装化”的进度提前。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为了维持其在朝鲜半岛的军事优势，将驻日美军派往朝鲜半岛。为了弥补驻日美军减少带来的安保力量缺失，美国要求日本建立警察预备队。经过美日双方的讨价还价，1950年8月，吉田内阁颁布《警察预备队令》，正式成立警察预备队，之后又改名为保安队。1952年日本政府设立保安厅及海上警备队，同时将保安队和海上警备队归保安厅管辖。1954年日本将保安队改为陆上自卫队、海上警备队改为海上自卫队，新建航空自卫队，由新设的防卫厅管辖。然而，也正是由于自卫队的成立，使得日本社会对自卫队的使命及作用产生疑虑，尤其是美国为了扶持新建的航空自卫队而允许日本装备美国的F86F战斗机时，更是引发日本社会的担忧。为此，在1955年7月举行的第22届国会会议中，时任防卫厅长官杉原荒太在回答质询时首次使用“专守防卫”一词。<sup>①</sup>而在7月9日举行的国会答辩中，杉原荒太还就“专守防卫”的含义进行解释，“专守防卫就是专门负责防卫，防卫到底”。<sup>②</sup>尽管“专守防卫”概念在1955年就已出现，但此后较长一段时期，“专守防卫”并未在日本政治家中得到广泛使用。直到1970年中曾根康弘就任日本防卫厅长官之后，“专守防卫”才开始频繁出现在日本政府的官方文件及政治家的言论中。

1970年1月，在中曾根康弘的全力推动下，日本政府发布了战后首份防卫白皮书，对日本的防卫政策进行阐释并向世界公开日本自卫队的现状。防卫白皮书对“专守防卫”概念有了较以往更为清晰的界定，其不仅明确表示“日本的防卫政策，本质上就是专守防卫”，同时还指出日本防卫力量的构建受到日本宪法及防卫政策的限制，具体限制包括“第一，防卫力量的规模要与可以履行自卫的能力相当，不可超越自卫的限制。第

① 「第22回国会、衆議院内閣委員会」第34号、昭和30年7月5日、<https://kokkai.ndl.go.jp/#/detail?minId=102204889X03419550705&current=10> [2023-07-17]。

② 「第22回国会、衆議院内閣委員会」第37号、昭和30年7月9日、<https://kokkai.ndl.go.jp/#/detail?minId=102204889X03719550709&current=6> [2023-07-17]。

二,关于核武器方面,坚持遵守无核三原则,并且日本防卫力量的构建要与日本国力相适应”。<sup>①</sup>同时,在第70届临时国会答辩中,时任首相田中角荣接受质询时表示:“专守防卫或者专守防御是日本国防的基本方针,此种认识并未发生改变,即使出于防卫目的需要攻击对方基地,受专守防卫的限制也不能发动攻击,只能守卫日本国土及周边。”<sup>②</sup>

## 二、“大国意识”下“专守防卫”政策的发展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实力的持续增长,日本国内支持增强军备、积极开展自主外交的“大国意识”泛起。与此同时,国际形势日趋紧张,美苏两极对抗进一步发展,苏攻美守的态势下,美国希望日本能够强化自身军事实力,共同应对苏联威胁。

首先,1976年日本制定《防卫计划大纲》,首次提出构建“基础防卫力量构想”,将军力建设的重点向发展威慑力量的方向转变。<sup>③</sup>调整最为明显的是扩大“专守防卫”的范围及改革军事方针。一方面,日本政府提出“专守防卫”政策时,其防卫范围主要局限在日本国土及周边,而在1983年发布的防卫白皮书则明确提到海上交通线的防卫,并将1000海里左右的海上交通线纳入“专守防卫”的防卫范围;<sup>④</sup>另一方面,“专守防卫”政策的本质是“防卫”,但1976年版的《防卫计划大纲》以及1978年《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则突破“专守防卫”的原有内涵,通过构筑基础的防卫力量来发展威慑力量,改变以往消极被动的防御,开始向积极主动防御的方向发展。

其次,加强日美安保合作,强化日美同盟。美苏冷战对抗的升级,使

① 「第2部 日本防衛のあり方」、『日本の防衛』、昭和45年版、[http://www.clearing.mod.go.jp/hakusho\\_data/1970/w1970\\_02.html](http://www.clearing.mod.go.jp/hakusho_data/1970/w1970_02.html) [2023-07-17]。

② 「第70回国会、衆議院本会議」第4号、昭和47年10月31日、<https://kokkai.ndl.go.jp/#/detail?minId=107005254X00419721031&current=1> [2023-07-17]。

③ 「第2章 わが国の防衛政策の基本と新防衛大綱、新中期防など」、『防衛白書平成17年版』、防衛省 [http://www.clearing.mod.go.jp/hakusho\\_data/2005/2005/html/17221200.html](http://www.clearing.mod.go.jp/hakusho_data/2005/2005/html/17221200.html) [2023-07-17]。

④ 「第3部 わが国防衛の現状と課題」、『防衛白書 昭和58年版』、防衛省、[http://www.clearing.mod.go.jp/hakusho\\_data/1983/w1983\\_03.html](http://www.clearing.mod.go.jp/hakusho_data/1983/w1983_03.html) [2023-07-17]。

得美国对日本在安保领域的需求持续上升。美国希望日本增强军备，强化双方在安保领域的合作。为此，1978年日美发布《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双方决定强化在作战、情报搜集及后勤支援等方面的合作，美国负责提供“核保护伞”，支持日本自卫队负责日本全境及周边海空域的防卫作战，并将远东列为日美安保合作的区域。<sup>①</sup>为进一步提升日美同盟对苏联的威慑，日本积极向美国靠拢，不仅强调作为“西方一员”的身份，同时也有意强化军力建设，将日本打造成美西方遏制苏联的前沿阵地。1983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访问美国期间，发表“日本是美国不沉的航空母舰”的言论，引发日本社会对于日本是否放弃“专守防卫”政策的争论。<sup>②</sup>

再次，提升自主意识，推出“综合安全保障战略”，主动应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安全形势。1980年时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提出“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开始尝试通过政治、经济、外交等手段重塑国际环境，以便谋求日本的综合性安全。在“综合安全保障”的指导下，1986年7月，日本政府成立“安全保障会议”以取代“国防会议”，“安全保障会议”不仅保留原“国防会议”审议国防安全重要事项的职能，同时还拥有审议国家重大紧急事态的职能。因此，“安全保障会议”一定程度上发挥着日本有关国家安全问题最高决策机构的职能。

一方面，日本推动自卫队走出国门，积极参与冷战后国际安全秩序的构建。冷战结束之际，日本的经济实力处于强盛时期，为了更好地将经济实力转换成国际影响力，日本积极参与冷战后国际安全框架的构建。为此，1992年日本制定《联合国维和行动合作法》，派遣自卫队员赴海外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

另一方面，强化同盟，调整国家经略方向。第一次朝核危机的爆发，让日美同盟找到新的目标，也促使日本开始调整安保政策。经过日美两国政府的长期磋商，1996年日美联合发表《日美安保共同宣言》，重新定义日美同盟，扩大日美安保合作的范围和领域。1997年两国发布《日美防卫

① 「日米防衛協力のための指針」、防衛省・自衛隊、<https://www.mod.go.jp/j/approach/ampo/allguideline/sisin78.html> [2023-07-17]。

② 藤田直央「『不沈空母』発言あったのか？ 34年前の謎に迫った記者」、朝日新聞デジタル、2017年2月5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K1M6DCFK1MUTFK01H.html> [2023-06-19]。

合作指针》，强化共同应对“周边事态”的军事机制。日美同盟关系的再定义促使日本调整防卫政策，1995年日本政府发布《防卫计划大纲》，尽管“基础防卫力量构想”等核心概念被沿用，但强调日本需要保持一支高效、可靠的防卫力量，从而介入地区及全球安全事务，并且日美同盟在日本安全政策中的重要性上升。<sup>①</sup>1999年日本政府制定《周边事态法》，强化对周边安全事务的应对能力。此次防卫政策调整最明显的特征是，日本安全政策经略的方向从俄罗斯向西南方向转移，应对朝鲜及中国的潜在威胁成为重点。同时，日美同盟的性质已经发生改变，由保护日本为主要目的向成为日美介入地区安全事务的安全机制转变，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作用逐渐增强，“专守防卫”政策面临被架空的风险。

### 三、“专守防卫”政策的终结及“反击能力”构建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形势进一步复杂化。2001年“9·11”事件的发生、第二次朝核危机的爆发、中日关系由于历史问题陷入动荡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等具有重大影响的地缘事件的发生，使得日本持续审视面对的国际安全形势及地缘安全环境。也正是在应对地缘危机的过程中，日本开始加速推动“国家正常化”和“军事大国化”进程。尤其是安倍第二次担任日本首相以来，安倍在国防强军路线方面的持续推进，使得日本的“专守防卫”政策空心化，而岸田推出的强化构建“反击能力”的新版“安保三文件”则宣告日本“专守防卫”政策的终结。

#### （一）支持自卫队走向全球，积极介入国际安全事务

冷战结束之际，日本曾利用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框架支持自卫队走出国门，积极参与地区安全事务的治理。“9·11”事件发生后，随着美国的全球战略向反恐转移，日本也借助美国的反恐战争，在地区乃至全球区域通过推进日美安保合作推动自卫队更多介入国际安全事务。2001年小泉内阁推出《反恐特别措施法》，使得日本政府向海外派遣自卫队合法化。根据该法律，日本自卫队出兵印度洋为美国在中东的反恐战争提供油料、水等保障。2002年《武力攻击事态法》通过，将行使武力的时机由遭受敌人入

<sup>①</sup> 山口昇「日米同盟再定義」、Nippon.com、2012年2月10日、<https://www.nippon.com/ja/features/c00204/?pnnum=1> [2023-07-17]。

侵提前到“遭到武力攻击”或者“可能遭到武力攻击”时，突破“专守防卫”政策的规定。2004年12月，日本政府出台《防卫计划大纲》，从战略上确立了积极有为的战略思路，通过强化日美安保体制、加强国际合作从而改善国际环境。<sup>①</sup>2007年福田内阁强行通过新的《反恐特别措施法》，从而恢复了日本自卫队在印度洋地区的支援活动。事实上，日本自卫队在印度洋地区的支援活动，突破了《周边事态法》中自卫队对美支援活动的区域在“周边区域”的限制，日本政府不顾法律的限制及国内舆论的质疑，支持自卫队在中东地区对美支援活动，显示日本政府想要利用日美同盟来更加积极地介入国际安全事务。2012年安倍再次担任日本首相后，全面强化日美同盟，通过打造“全球性日美同盟关系”，更加积极地介入国际安全事务。2015年4月，新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正式公布，时任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此次指针的修订是美日安全合作的转折点。”<sup>②</sup>新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不仅改变以往日美同盟中美国保护日本的单向防卫体制，使得日美在未来安保合作中更加对等，同时还让日美安保合作突破地域限制，日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进行安保合作。<sup>③</sup>全球性日美同盟关系的建立在日本介入国际安全事务的同时，也让日本卷入国际冲突的概率增大。

## （二）推动“强军工程”，加速日本向“军事大国化”迈进

2012年安倍重掌政权后，持续推动安全防卫体制改革，谋求全方位、多领域加速日本向“军事大国化”迈进。首先，在安保理念层面提出“积极和平主义”。2013年9月，日本首相安倍在“安保与防卫力量恳谈会”上，首次提出“基于国际协调主义的积极和平主义”，此后该理念成为日本国家安保战略的基本理念。所谓“积极和平主义”是打着和平主义的旗号强军扩武，从而摆脱战后体制的限制，推动日本更多介入全球及区域

① 「平成17年度以降に係る防衛計画の大綱について（安全保障会議決定、閣議決定）」、平成16年12月10日、<https://www.kantei.go.jp/jp/kakugikettei/2004/1210taikou.pdf> [2023-07-17]。

② 「日米、世界で安保協力 ガイドライン18年ぶり改定」、『日本経済新聞』、2015年4月28日、[http://www.nikkei.com/article/DGXLASF27H6F\\_X20C15A4MM8000/](http://www.nikkei.com/article/DGXLASF27H6F_X20C15A4MM8000/) [2023-07-17]。

③ 「日米防衛協力のための指針」、防衛省・自衛隊、2015年4月27日、[https://www.mod.go.jp/j/approach/anpo/allguideline/shishin\\_20150427j.html](https://www.mod.go.jp/j/approach/anpo/allguideline/shishin_20150427j.html) [2023-07-17]。

安全事务。其次，在安保战略层面制定首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从顶层设计强化对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指引。2013年，在安倍的主导下，日本政府推出战后首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并以此为基础制定新版的《防卫计划大纲》及《中期防卫力量整備计划》等国家安全领域的纲领性文件，为安倍执政期间的“强军扩武”计划提供顶层设计。再次，在运行机制和制度建设方面，安倍执政期间成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设立防卫装备厅，并不顾日本舆论的反对制定《特定秘密保护法》及新安保法，为日本“强军扩武”打开方便之门。此外，部分解禁集体自卫权，废弃“武器出口三原则”等，进一步推动日本向“能战”国家转型。

安倍推动的国家安全政策改革在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政策变革中无疑是最为激进的，“专守防卫”政策的内涵不但面临被掏空的风险，甚至支撑“专守防卫”政策的部分支柱和框架也被拆解和替换。因此，安倍对日本国家安全政策的改革具有系统性、全面性及前瞻性的特点。其改革并非只是对现有安全政策的法理基础、规则以及决策体制进行修补，而是从理念、法律支撑、决策机制、体制、防卫装备、自卫队的战略部署等领域全面展开。尤其是为了规避修宪所引发的负面冲击，安倍通过制定新安保法来实现对集体自卫权的部分解禁。更为重要的是，安倍的“强军改革”让原先处于重要且敏感的领域不断被突破，重塑日本社会对“强军扩武”“修宪”等敏感内容的认知，从而为岸田强化构建“反击能力”的“安保三文件”的出台埋下伏笔。

### （三）构建“反击能力”，终结“专守防卫”政策

2022年12月16日，岸田内阁以决议的形式通过《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備计划》三份安保文件，这三份安保文件是引领未来15年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其对于构建“反击能力”、扩充防卫开支等内容的规定，成为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政策重要转折，尽管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构建反击能力，并非是要改变日本的安全政策，而是坚持基于日本国宪法基础上的专守防卫”。<sup>①</sup>

<sup>①</sup> 「岸田首相が主張する新解釈…専守防衛は『海外派兵しない』過去の自民政権は『敵基地攻撃しない』だった」、東京新聞、2023年3月28日、<https://www.tokyo-np.co.jp/article/240512> [2023-07-17]。

第一，大幅增加防卫费支出，对标北约。在战后日本的防卫预算中，防卫费的支出情况一直是观察日本军力发展的重要指标。尽管20世纪80年代在大国意识的推动下，有日本政治家提出取消防卫费支出占GDP的1%限制，但由于受历史及社会舆论等多种因素影响，日本政府依然遵守1%的红线。直到2012年安倍再次执政以来，日本每年的防卫费支出连年增长，已触及GDP的1%红线。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甚至宣布在2027年将防卫费支出占比提升到2%，直接对标北约。为此，岸田内阁通过决议，将未来五年的防卫预算增至43万亿日元，然而据日本媒体测算，未来五年的防卫费支出实际将达到近60万亿日元。<sup>①</sup>

第二，购入及研制进攻性武器，强化“反击能力”。2023年2月27日，岸田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表示，日本将从美国购入400枚“战斧”巡航导弹，并将其作为强化“反击能力”的手段。<sup>②</sup>众所周知，战斧巡航导弹是美国海军开展中远程打击的重要力量，由于其精度高、威力大而成为美军发动进攻的先锋。同年8月28日，美国批准向日本出售增程型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巡航导弹“贾斯姆”（JASSM-ER）及相关设备。这是战后以来美国首次向日本出售远程空对地巡航导弹。该导弹射程约1000多公里，日本一旦装备该导弹将具备远程攻击能力。除了引进美国的远程打击力量外，日本还积极研制日版“战斧”巡航导弹。当前日本正积极推进12式岸舰导弹的升级改造，力图在12式岸舰导弹的基础上研制出空基型号、海基型号以及潜射型号，进一步提升陆海空自卫队的进攻能力，而在射程方面将从目前的200公里提升到400公里及900公里，增强日本在防区外的打击能力。

第三，深化日美安全合作，加速推动日美军事一体化建设。日本“反击能力”的构建，离不开美国武器装备以及军事技术等支持。为了提升日本的安保实力，增强日美同盟的威慑力，日美不仅积极推动双方在网络、太空及先进技术等跨领域合作，而且还希望在指挥体制及作战体系等领域

① 「防衛費5年間で大幅増の43兆円、実際は60兆円近くに膨張 そのわけは…」、東京新聞、2022年12月31日、<https://www.tokyo-np.co.jp/article/222914> [2023-07-17]。

② 「米ミサイル『トマホーク』購入は400発、26年度以降に配備…岸田首相が公表」、読売新聞、2023年2月27日、<https://www.yomiuri.co.jp/politics/20230227-OYT1T50237/> [2023-07-17]。

实现日美一体化合作。新版“安保三文件”明确提出设立能够有效管辖陆海空自卫队的“联合司令部”及“联合司令官”。事实上，近年来，日本一直借鉴美军的指挥体系，让自卫队融入美军作战体系中，从而推动日美军事一体化的加速发展。“联合司令官”设立后，联合参谋长和“联合司令官”的指挥边界将会有明确的区别，联合参谋长负责日本自卫队的日常管理和能力训练，“联合司令官”则负责自卫队的指挥和调配。日本仿照美国指挥体系完善自卫队指挥体系建设，不仅能强化日本政府对陆海空自卫队的指挥，同时也将日美指挥体系对接，强化驻日美军对日本自卫队指挥体系的控制。

尽管《国家安全战略》对“反击能力”的内涵及何时运用等内容进行了规定，但在具体操作中依然存在诸多模糊之处，包括，如何判断对方是否准备对日本发动导弹攻击？最小限度的自卫措施中的最小限度该如何定义等。因此，有日本学者认为“反击能力”的提出标志着日本安全政策的重大变革。<sup>①</sup>

#### 四、结语

战后日本的“专守防卫”政策是日本政府综合平衡“和平宪法”、日美同盟以及经济发展等多种因素下的产物。日本政府声称坚持“专守防卫”政策，不做军事大国，但随着国内外安全环境的改变以及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专守防卫”政策被不断掏空，难以对日本未来的安全政策走向发挥应有作用。尤其是岸田内阁在“安保三文件”中明确提出要构建“反击能力”，不仅违反“专守防卫”政策，同时也将加速日本“和平宪法”的解体，冲击亚太地区的安全秩序及中日关系发展。因此，战后日本安全政策由“专守防卫”向构建“反击能力”的方向转变，不仅威胁日本“和平宪法体制”，同时也对地区安全形势及周边国家关系产生严重冲击。

一方面，威胁战后日本“和平宪法体制”，加速日本走向“正常国家”

---

<sup>①</sup> 田中均「『反撃能力』は日本の国力を本当に強くするのか、安保政策大転換で考えるべきこと」、ダイヤモンド・オンライン、2022年12月23日、<https://diamond.jp/articles/-/314987> [2023-07-17]。

与军事大国。“专守防卫”政策脱胎于战后日本的“和平宪法”，1947年施行至今的《日本国宪法》第九条规定“放弃战争”、不保持战争力量，才使得战后日本只保有最低限度的防卫力量，且坚持“专守防卫”。然而，战后日本一直想要摆脱“和平宪法”的束缚，摆脱“战后体制”对日本的约束。尤其是2012年安倍长期执政以来，通过修改“宪法解释”和制定新安保法，为自卫队的海外派兵和“解禁集体自卫权”打开方便之门；岸田上台后则通过“新安保法”来构建“反击能力”，将日本自卫队打造成能攻能守的“国防军”从而颠覆战后日本一直坚持的“专守防卫”政策，肢解战后日本的“和平宪法体制”。

另一方面，激化地区安全形势，威胁地区的和平发展。日本构建“反击能力”将持续增强日本的军事实力，激发其进一步介入地区安全事务。尤其当前中美战略博弈加剧，亚太地区形势日趋紧张的背景下，日本安全政策由“专守防卫”向构建“反击能力”的方向发展，将有可能让日本成为威胁亚太地区和平安定的“危险因素”。毕竟日本构建的“反击能力”是以“先发制人”为核心，只要日本认定其他国家准备对日本发动攻击，那么就可以在未受攻击或未产生实际损害时进行反击。2022年12月20日，日本防卫大臣滨田靖一表示：“只要他国准备对我进行攻击，日本不必等实际损失的发生也可以发动反击。”<sup>①</sup>

总览战后日本安全政策的发展，如何规避“和平宪法”的束缚、摆脱“专守防卫”政策的约束，是其安全政策变革的主要特点之一。尽管日本政府多次重申发展“反击能力”并非是要放弃“专守防卫”政策，但从实际的推进来看，“反击能力”的构建不仅摆脱战后“和平宪法体制”的约束，同时也让“专守防卫”成为一句空话。随着远程打击武器的持续到位及无人军事科技的发展，未来日本的安全政策将发生更为激进的变革。

（责任编辑：张倩）

---

<sup>①</sup> 防衛日報デジタル編集部「浜田防衛相反撃能力行使のタイミングは『武力攻撃に着手した時』」、防衛日報デジタル、2022年12月23日、[https://dailydefense.jp/\\_ct/17595134](https://dailydefense.jp/_ct/17595134) [2023-08-03]。

## Abstracts

### 70 Years of U.S.–ROK Alliance: the Trend towards “Global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Alliance”

SUN Ru and YAO Diwen / 1

**Abstract:** The year of 2023 marks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U.S.–ROK Alli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as evolved into a global, comprehensive and strategic alliance, and 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the alliance to the U.S. and ROK has increased. The geographical scope of U.S.–ROK alliance cooperation extends beyond the Korean Peninsula to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the world. The fields of alliance cooperation are constantly expanding, from the military alliance during the Cold War to the economic alliance, technology alliance and value alliance. The Yoon Suk Yeol administration formally proposed to build a Global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Alliance and it has already made some progress. The U.S. has reaffirmed its “nuclear umbrella” by upgrading extended deterrence. Both sides have enhanced coordination on Indo–Pacific strategy and global challenges. They have further cooperated in the fields of economy, technology and common value. However, the alliance cooperation will confront multiple challenges from both within and outside.

**Keywords:** U.S.–ROK alliance; global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alliance; Northeast Asian security; Indo–Pacific strategy; China–ROK relations; China–U.S. relations

### An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of Japan’s Security Policy after the WWII

ZHU Qingxiu and WU Huaizhong / 19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since the end of WWII,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s basically adhered to the policy of “exclusive defensive posture” and developed only a minimum defense force. However, with the changes of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Japan’s domestic political environment, Japan’s security policy began to change from the “exclusive defense” to the direction of emphasiz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ounterattack capability”. Japan’s construction of “counterattack capability” not only violates the “exclusively defensive” policy, but also will accelerate the dissolution of Japan’s post-war “peace constitution” system, which will have an impact on the security situ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neighboring countries. With the deployment of long-range strike weap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unmanned military technology, Japan’s security policy is bound to develop in a more aggressive direction in the future.

**Keywords:** exclusively defensive posture; pacifist constitution; security policy; counterattack capability; Japan–U.S. alliance